



中国主流文化的 战略导向

明代个案研究

ZHONGGUO ZHULIU WENHUA DE
ZHANLUEDAOXIANG

李晓燕 / 著

中国主流文化的战略导向 ——明代个案研究

李晓燕 著



世界学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主流文化的战略导向:明代个案研究/李晓燕
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1. 3

ISBN 978 - 7 - 5012 - 4044 - 9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6976 号

责任编辑 罗养毅
责任出版 赵 珩
责任校对 张 琨

书 名 中国主流文化的战略导向——明代个案研究
Zhongguo Zhuliu Wenhua de Zhanlue Daoxiang ——Mingdai
Gean Yanjiu

作 者 李晓燕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印 刷 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880 × 1230 毫米 1/32 10% 印张

字 数 28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1 年 5 月第一版 2011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012 - 4044 - 9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秦亚青

战略文化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对战略文化的系统研究依然是一个学术的前沿课题和亟待深入的领域。李晓燕博士的专著在战略文化框架之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一个国家的战略文化与这个国家的主流文化是否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在国内外战略文化研究领域中,这是一个新的问题,因此也就引出了新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书是填补研究现状空白的一次有益尝试。

该书有三个突出的特点。其一,融合中西。这是一次融合中国和西方学术思想的大胆探索。战略文化的实践是人类的重要活动,战略文化的概念是西方学者提出来的,在过去30年里,不少西方学者也使用这一概念进行了多维度的研究,包括对中国战略文化的研究。一方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如何解读西方学者的战略文化理论,如何思考自己的战略文化,如何深入发掘国际关系领域里中国文化积淀和传统所产生的文化力,同样会触动中外学者的学术神经,激发他们的学术兴趣。当今世界已经不是19世纪、20世纪之世界,当今中国也不是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中国,“人类之体、天下之用”更应当是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胸怀与气度。

其二,史论结合。该书是以历史文本为实证数据和资

料,运用历史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做出认真细致的论证。作者既采用了提出理论假设和进行实证检验的方法,也大量使用历史文献作为支撑论证过程的第一手资料。文献分析选取了儒家经典《论语》《孟子》《荀子》和明史原始资料《明实录》中的《皇明宝训》。对这些原始文献的认真研读和细致分析,不仅反映了作者向传统文化汲取营养的意识和实践,也反映了一种不狷急、戒浮躁的为学态度。但凡真正的研究,总是以求真的精神去真实地探索。学术的志趣和学者的志趣大概体现在这份本真之中。

其三,力求创新。学术的动力在于创新,学术的生命也在于创新。诚然,战略文化的概念是西方学者提出的,但是,将战略文化的概念在中国语境中进行再定义、再诠释,将战略文化的分析框架在中国文化中再建构、再生成,使之产生新的意义、为之开拓新的研究空间,这本身包含了积极的创新。它不是对战略文化研究的机械效仿,而是对战略文化思想的重构。学术的乐趣和学者的乐趣大概也就在这种创新的求索过程之中吧。

该书的作者李晓燕是我曾经指导的博士生,现在已经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一名教师。从攻读博士学位到毕业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她一直专注于战略文化理论和中国的战略文化研究,相关论文已经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等刊物上陆续发表,其研究成果也颇具新意。目前,国内在战略文化领域重学理的系统研究还不多见,所以,我期望该书的出版能够推动国内战略文化研究的深化,促进中国学者与其他国家的学者就中国战略文化展开积极的对话。

是为序。

目 录

导论 为什么研究中国的战略文化	1
第一章 战略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8
一、西方学者的工具论观点	9
二、中国学者的决定论假定	20
三、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25
第二章 战略文化与主流文化	35
一、文化	35
二、战略文化	40
三、主流文化	46
四、本研究的理论设计	49
第三章 中国主流文化的战略倾向	57
一、文献选择	58
二、文献分析	59
三、小结	82
第四章 明代决策者对中国主流文化的内化程度	85
一、文献分析	90
二、小结	178

第五章 明代决策者的战略文化倾向	185
一、文献分析	186
二、小结	306
第六章 结论	310
一、战略文化与文化的关系	311
二、中国的战略文化传统	315
三、中国方式的独特性	326
后 记	332

导论 为什么研究中国的战略文化

战略文化研究属于国际关系与军事战略两学科的交叉课题，在推动基础理论发展和实际指导国家外交与安全战略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战略文化，简单说就是一个国家对如何确保国家安全的基本途径所进行的系统思考。一个国家是倾向于以温和友好的方式，还是强硬扩张的方式与别国打交道，不仅反映该国的国家安全观念，也反映该国的对外交往理念，进而影响该国的国际形象。

自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在分析苏联的战略行为时首次使用“战略文化”这个概念以来，西方学者的战略文化研究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就理论研究而言，他们构建了比较完整的框架和概念体系，并且表现出日益成熟的代际发展特征，当然，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该研究领域的话语主流地位。但是，就实证和案例研究而言，西方学者的研究并没有形成十分集中的方向，美国、中国、日本、利比亚、西班牙、欧盟等，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成为学者们探讨的个案，研究方向的不集中造成目前被广泛认可的研究成果也不多，这不能不说是战略文化研究的一个遗憾。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整体研究方向不集中的现状里，中国的战略文化特点却受到了几乎是最高程度的关注，对中国战略文化特征的探讨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保持了持续升温的态势。

1995年美国学者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出版的《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中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①一书甚至成为

^①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

西方战略文化研究的划时代作品，不仅标志着研究方法的重大突破，而且成为此后所有从事战略文化研究的学者们不能忽略的必读参考书。该书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与作者对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的分析定性有关。作者立足于冷战结束初期的国际背景，观察实力日益增长的中国，尽管研究方法的创新值得肯定，但是其结论仍然没有摆脱冷战思维的偏见，把中国定性为进攻性战略文化的国家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眼球，也迎合了当时主流国际体系的西方国家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世界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文化现实主义》的影响之深，是迄今在它之后出现的任何战略文化作品都没能超越的，这就使得它对中国战略文化的定性也一直没有受到根本的挑战。尽管在江忆恩之后仍然有其他学者研究中国的战略文化问题^①，并且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和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取得重大成就，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对中国的战略文化特征给予了更为客观积极的评价，但是这些评价的影响力都无法匹及当年的《文化现实主义》。以至于目前的战略文化研究在西方学界已经略显沉寂，虽不乏新人新作，但是尚未出现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争论的著述。特别是，美国学者已经很难把持由他们开辟的这块学术阵地的话语主流权。

中国学者的战略文化研究起步相对美国学者整整晚了二十年，并且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探索战略文化课题以来，中国学者同时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就是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大幅提升，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学者在思考战略文化的基本概念和理论问题的同时，常常还需要思考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战略文化传统溯源、当前战略文化定位，

^① 其中有两位学者的研究也非常系统，其代表作分别是：Huiyun Feng,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Routledge 2007) . Andrew Scobell, *China's Use of Military Force: Beyond the Great Wall and the Long Marc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以及未来战略文化形象展示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学术研究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国际社会所关注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解释和回答。

作者从梳理和分析三十年来国内外战略文化研究的已有著述入手，发现其中一个被忽略的重要问题，即一个国家的战略文化特征与该国的主流文化特征是否必然表现一致？该研究认为，中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过于简单，西方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否定回答又过于武断。双方都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充分的研究和论证。唯一一部有影响的作品是美国战略文化研究领军人物江忆恩的代表作《文化现实主义》，其研究结论又颇受争议。

《文化现实主义》以中国明代为个案，断言中国的战略文化特征具有双重性，表面宣称与中国儒家文化一致的温和倾向，实际是进攻型的强现实政治（realpolitik）战略文化。《文化现实主义》奠定了江忆恩在战略文化研究领域的显赫地位，其影响力在过去的十五年间一直无人能及。但是，这种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是由他对中国战略文化的定性带来的。十多年来，中外学者们也有很多的文章和评论质疑和反驳江忆恩的论证，但是能够与《文化现实主义》展开有效的对话，得出与“中国好武”不同结论的成熟作品却极为少见。^① 于是，在战略文化研究领域，每当有西方学者质疑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时，《文化现实主义》就成为他们重要的引证资料。作者认为，打破这种局面理应成为中国学者的时代责任，这也是本书创作的现实意义所在。

① 2007年美国犹他州立大学政治学系讲师冯惠云出版了她的博士论文，也是用实证的方法，借助计算机数据模型，通过对新中国几代领导人战略观点的分析，对江忆恩的研究进行了回应与反驳，认为不能对中国领导人的战略文化倾向一概而论，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几位领导人的战略文化表现也有不同。详见：Huiyun Feng,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 making: Confucianism, leadership and war*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理论上，本书借鉴江忆恩对战略文化做实证研究的模式，用文献分析支持对一国战略文化特征的定性，以中国明代为个案展开研究，最终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战略文化的和平倾向与中国儒家文化的战略主张是高度一致的。论证方式一样，结论完全不同，这正是科学实证主义主张的研究方法。所以，本书在理论上能够更好地与推崇实证研究的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展开对话，结论上能够反驳西方学者对中国战略文化的定性，学术价值由此凸显。而且，本书的研究设计还修正了《文化现实主义》存在的偏差，理论模式上增加了新的研究变量——文化的内化程度，从而使逻辑推理更加严密。方法上完善了分析框架，使复杂的文献分析得以更加清楚地呈现观点主张，同时也让读者能够比较容易地了解文章的论证过程。更值得肯定的是，作者选择了儒家经典文献和明史原始文献支持自己的研究，是中国学者向传统文化汲取营养，将中西文化融会贯通的积极尝试。

全书的理论设计遵循科学实证主义的原则，通过三步骤验证一个基本假设：一国的战略文化表现是否与其主流文化特征相一致取决于国家决策者是否内化了该国的主流文化。为了对“文化”进行实证研究，必须确定可观察的文化载体作为分析对象，该书选择的是集中反映一个国家战略文化和主流文化的重要文献，确定其核心观点主张，从而判断该国的主流文化和战略文化特征。

具体说来，各章的主要内容观点分别是：

第一章，通过归纳分析中外学者的战略文化研究历程和现状，在肯定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双方都存在的问题，即，对文化—战略文化—国家行为三个核心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有失偏狭，特别是对文化与战略文化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不够充分。该书的研究目标即是希望考察，对一个民族国家而言，其主流文化特征与战略文化表现是否必然一致或者不一致？作者认为，两者之间是否一致可能取决于一个重要的干预变量——文化的内化程

度。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战略文化表现是否与其主流文化特征相符合，取决于国家的决策者是否内化了该国的主流文化，内化程度高，战略文化表现与主流文化特征的一致性也就高。该研究即是对这个基本假设进行的系统验证。

第二章说明了该书的核心概念与研究方法。作者的研究重点不是基础理论，所以都是借鉴相关学科优秀成果对研究的核心概念——文化、主流文化、战略文化——进行的界定。其中，界定“文化”采用了学界广为认可的概念内涵。“主流文化”是基于本研究的需要，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对“文化”概念外延的缩小。“战略文化”概念也是吸取了前人成果中最受肯定的内容：一国长期积累下来的关于使用武力对于获取国家安全的效用的基本认知。接下来，说明了该研究验证基本假设的三个步骤，使用文献分析方法的原因，以及选择分析的文献、分析的具体方法、论证框架。最后，解释了以中国明代作为研究个案的原因。

第三章确定中国主流文化的战略倾向。该研究认为儒家文化即中国主流文化，并且选取了作者认为最集中体现儒家文化核心思想的《论语》《孟子》《荀子》三部文献进行分析。首先，列举了三部文献中有关“王道”“仁政”、国家安全、战争、华夷关系的内容。然后，运用直观反映文献观点主张的综合认知图清楚呈现这些儒家经典的战略倾向。最后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主流文化在战略问题上总是主张优先、并且尽可能用和平方式获得国家安全，明确反对穷兵黩武。这是验证该研究基本假设的第一步。

第四章分析明代决策者对中国主流文化的内化程度。选取了明史原始资料《明实录》附录中的《皇明宝训》这些记载明朝历代君主思想言论和重大决策的文献进行分析，考察历代明朝皇帝对儒家文化的内化程度。通过逐一列举和分析其相关记载，该研究发现，历代明朝皇帝对中国儒家文化都是思想上高度认可，并且切实贯彻到他们执政期间的各项决策中去的，也就是说他们对中国主流文化的内化程度非常高。这是验证该研究基本假设的第

二步。

第五章确定明代决策者的战略文化倾向。通过分析《皇明宝训》中关于历代明朝皇帝对国家安全、战争、华夷关系的观点和决策记载，逐一列举和分析其相关内容，并且用综合认知图呈现其观点主张。该研究发现，历代明朝皇帝都高度倾向于用“王道”“仁政”的和平方式获取国家安全，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坚持“怀柔远人”“来不拒、去不追”的原则，对使用武力非常谨慎，更加明确反对穷兵黩武。也就是说，历代明朝皇帝的战略文化倾向与中国主流文化的战略倾向是高度一致的。这是验证该研究基本假设的最后一步。

第六章结论。首先简要总结了该研究的理论设计，并且根据验证基本假设的三步骤得出结论，认为该研究的基本假设在中国明代的个案研究中得到了证实，明代决策者高度内化了中国儒家文化，因而也表现出与儒家文化的和平战略倾向高度一致的战略文化特征。这就是说，一国的战略文化表现是否与其主流文化特征相符合，取决于国家决策者对该国主流文化的内化程度，内化程度越高，两者的一致性也就越高。受到该研究的启发，作者最后又简单归纳了中国的战略文化传统，以及中国处理问题的独特方式，借以说明为什么中国会形成不一样的战略文化传统。作者认为，中国的独特方式和战略文化传统能够为当前的国际秩序改革和国家间交往提供有益的思想借鉴，从而促进和谐世界的建立。

需要指出的是，战略文化研究是一个系统的课题，特别是对当代中国战略文化的研究，很多问题并不是仅仅在书斋里冥思苦想就能够找到答案的，它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息息相关，与中国的和平发展事业息息相关。一方面，中国的战略文化定位和形象展示要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逐步明朗化；另一方面，中国的国力增强和国际影响力提高又有赖于恰当

的战略文化定位和良好的战略文化形象展示，两者相互促进，密不可分。也就是说，对中国战略文化的研究既是一个学术课题，也是一个时代课题，需要经过理论研究而指导实践，反过来又从实践中总结经验而促进理论研究。

过去的十多年，中国学者刚刚经过熟悉战略文化研究的阶段，完成了对西方理论的引介和消化工作，但是能够突出中国视角和研究特色的成果还非常少。同时也因为就这个课题与西方学者的交流和对话没有充分展开，使得其中有一些优秀的作品并没有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可以说，由于研究起步晚，中国学者错过了西方学界积极争论中国战略文化特性的第一轮对话。

幸运的是，时代给了我们主流第二轮对话的机遇。当前，正是中国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空前提高的时期，中国的“和谐世界”理念受到世界关注，中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的积极贡献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越来越多的外国政府和人民希望了解中国，关心中国对诸多国际事务的看法。这无疑是我们展示中国战略文化、国家安全观念和对外交往理念的好机会。中国学者应当抓住机遇，系统介绍中国战略文化的优秀传统及其对当代中国战略文化定位的影响，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战略文化变迁的过程，以及未来中国战略文化发展的趋势。这些课题关系到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交往战略的定位，关系到中国国际形象的树立，对于赢得宽松友好的国际环境，保障和平发展事业的顺利进行都将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

第一章

战略文化研究的历史 与现状

战略文化研究出现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美国，当时的学者主要用该视角分析苏联的战略行为。1977 年杰克·斯奈德在研究苏联的有限核战争主义时首次使用了“战略文化”一词。他把战略文化定义为“一个国家战略共同体的成员通过教育或模仿所获得并且彼此共享的关于核战略的观念、有条件的情感反应以及习惯性行为模式的总和”^①。斯奈德认为，将苏联人的战略思维方式视为一种独特的“战略文化”可以解释苏联为什么倾向于单边而不是合作式的摧毁限制战略，正是美苏两国战略文化的差异导致了他们对待有限核战争的不同态度。相对西方而言，中国学者对战略文化的研究起步比较晚，以 1997 年李际均在《中国军事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战略文化》一文为标志，中国学者的战略文化研究迄今刚刚经过十多年。

^① Jack L. Snyder, *The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Limited Nuclear Operations* (The Rand Corporation, September 1977), p. 8.

通过总结中外学者的战略文化研究,可以发现,双方关注的问题都集中在文化—战略文化—国家行为三者的关系上,但是研究的侧重和观点存在很大差异。从杰克·斯奈德开始的30多年来,西方学者^①战略文化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主要是战略文化对国家行为的解释力。中国学者大多倾向于探寻不同国家战略文化传统的历史文化渊源、主要内容和行为表现是什么,而很少有人关注于解释这些现象形成的原因。对于文化—战略文化—国家行为三者的关系,西方学者基本持一种工具论观点,中国学者则在实际研究中坚持了决定论的假定。

一、西方学者的工具论观点

自美国学者江忆恩在其1995年出版的著作《文化现实主义》中提出对西方战略文化研究的三代划分^②以来,这种划分一直受到中外学者的广泛认可。江忆恩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早期是西方战略文化研究的第一代,主要观点是认为战略文化是国家行为的决定性原因。这一代的研究者主要是安全政策分析家和苏联问题专家,他们试图解释美苏两国对核时代的战略之所以有完全不同的想法,原因就在于其历史经验、政治文化、地理以及其他变量的差异。第二代研究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观点是认为战略文化只是一种工具,与实际的行为选择

① 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很多其他课题一样,战略文化研究也存在美国学者在研究者人数和已有成果上占据绝对优势的局面,但是美国学者也并非绝对垄断西方的战略文化研究,比如欧洲学者的研究:Michael J. Williams, *On Mars and Venus: Strategic Culture as an Intervening Variable in US and European Foreign Policy* (LIT VERLAG 2005)。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与防御中心的研究:Pauline Kerr, *Researching Security in East Asia: From "Strategic Culture" to "Security Culture"*, 1998, 也都非常有影响。鉴于他们在研究方法和观点主张方面更接近美国学者的研究,可以将其统称为“西方学者”的研究。

②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5-22.

没有必然联系。这一代研究者意识到象征性战略文化话语与实际原则有可能不同，前者被用来强化战略决策者的霸权以及加强后者的权威性与合法性。第三代研究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在战略文化是原因还是工具的问题上，他们基本上承认战略文化对战略选择具有重要影响。这一代研究往往把特定的战略决策作为因变量，以求为战略文化的解释力提供更为可靠和有效的经验验证，并且大都试图解释占主流地位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无法解释的战略选择。

可以看出，西方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战略文化与国家行为的关系上，他们对文化与战略文化的关系不是特别关注，但是在验证和争论战略文化对国家行为的解释力的过程中，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战略文化与一国的文化之间的不一致是可能的，甚至是必然的。有些学者明确指出战略文化并不反映一国的文化，后者只是一种象征性话语，只是起到工具的作用。这种观点与他们关于战略文化对国家行为的影响这个问题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西方三代战略文化研究中，第一代的决定论者认为战略文化的概念应该包括思想和行为模式两部分，因此一种战略文化往往必然与一种国家行为相联系。但是，这显然不能解释一国国家行为中与其所谓单一的战略文化不相符的现象。于是这些学者就进一步提出了一国的战略文化中可以包括多种不同的战略次文化，并且这些次文化可能与该国的文化是不一致的，甚至是对立的。这样，一个国家的多种不同的实际战略行为就可以与不同的战略次文化相符合，从而得到相应的解释。

例如，杰克·斯奈德在研究苏联战略文化时指出，苏联战略思想中存在两种倾向，一种强调威慑，另一种强调诉诸战争。前者相信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后者认为核战争有胜负之分。^① 苏

^① Snyder, *The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Limited Nuclear Operations*, p. 10.